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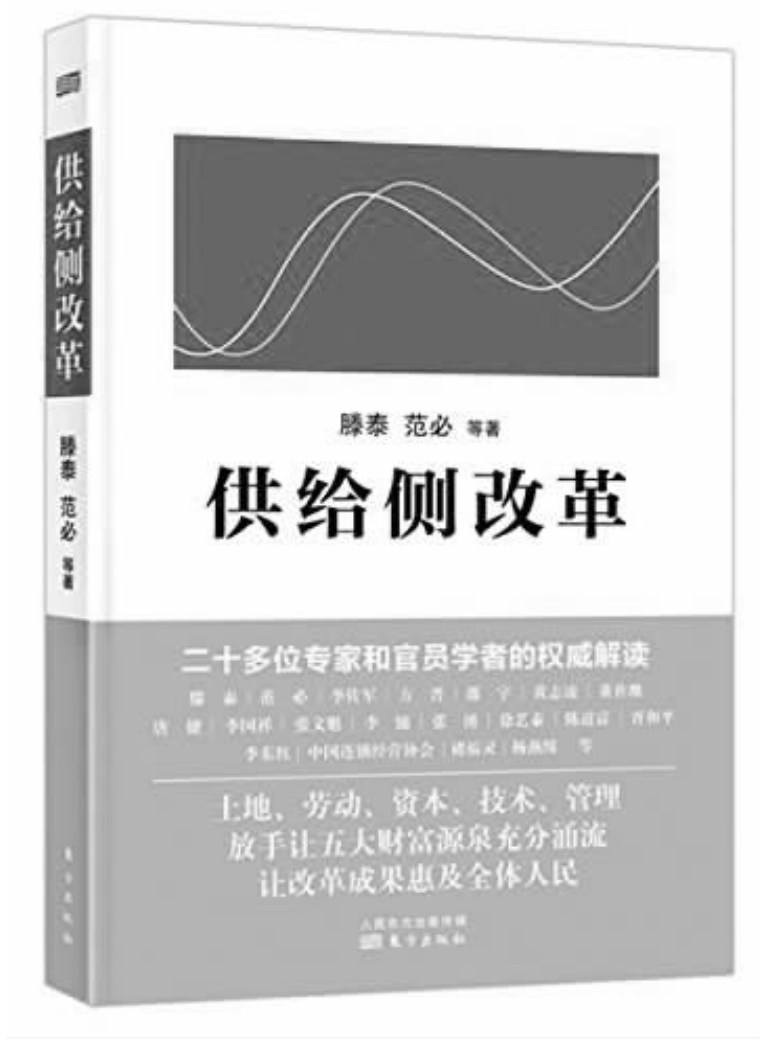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

□张鹏

“供给侧改革”成为了当下中国越来越热的一个词汇,曾经备受冷遇的供给学派经济学终于开始走向前台。在国内介绍供给主义、供给侧改革的相关书籍中,滕泰、范必等著的《供给侧改革》是系统性和权威性皆佳的一本,不仅总结了他们近几年从供给侧出发所做的思考和探索,同时标志着中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派已成气候。作者认为,中国过去20多年总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回归供给侧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重启增长新模式。

我国意欲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注重总需求管理向注重供给管理过渡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而问题之所在也是答案之所出。作者认为,受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的学说影响,以及货币主义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治理逻辑,在20多年的总需求管理过程中,宏观调控确实刺激过经济增长,也平抑过通货膨胀。但由于经济本身非常抽象,需求管理的节奏难以准确把握,再加上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预判不足,造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波动并未有效熨平反而被阶段性放大。“凯恩斯主义所信奉的投资、消费、出口,都不是财富的源泉,也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而是价值实现的条件,是企业生产出产品后能不能卖出去的影响因素;货币主义所看重的货币因素,更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只是间接影响需求的因素而已。如果能换个角度从供给面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放开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就别有一番天地了。”

作者进一步指出,只要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短期的增长率,而只要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融资成本、高行政成本、高垄断、高管制



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融资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从长期

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

书名:《供给侧改革》
作者:滕泰、范必等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权力与金钱的联盟

□赵青新

有一条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叫做“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实际价值高的货币(良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后来泛指类似经济现象。据说16世纪英国巨贾托马斯·格雷欣最早发现,因此以他命名。但是,中国台湾经济史研究专家赖建诚经过详细考证,说这是一个误会,格雷欣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这个问题,而真正分析过这个原理的哥白尼却被忽视了。

暂且搁置谁是原理的真正发现者。事实上,早在公元前5—前4世纪的古希腊就有过劣币驱逐良币的记载,13世纪的法国也有类似的记录,但直到16世纪的英国成为普遍现象才被归纳总结。亨利八世穷兵黩武,造成国库空虚,解决措施之一就是利用铸币降低成色,强行规定好钱和烂钱购买力相同,从中捞取财富。这就造成了英国货币的大幅贬值。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都希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内政乏力,靠增加税收、搜刮民众已近竭泽而渔,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外债筹措。托马斯·格雷欣就是在这种背景中出现的。

赖建诚近作《王室与巨贾》副标题名为“格雷欣爵士与都铎王朝的外债筹措”,很明显,这本书围绕着格雷欣的个人经历,探讨都铎王朝解决债务危机的途径,阅后发

现,它还扩展到了重商主义兴起的背景、金融势力的崛起以及欧洲各国的博弈格局。赖建诚的考据来源广泛,主要来自历史记载、传记作品、个人手稿、私函等,在相互的比对中尽力去伪存真,厘清事实,语言则平易朴实,全书整体风格显得学术不晦涩,严谨不枯燥。

格雷欣家族并非贵族,第四代的威廉、理查德、约翰三人经商获利后,接着往政治路线攀爬,理查德获得爵位,并与约翰先后任伦敦市长,格雷欣家族是亨利八世的债主。本书主角托马斯含着金汤匙出生,继承父辈事业,与英国王室自然关系密切,这是他被挑中担任代理人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格雷欣家族在欧洲商业圈的地位和人脉。金融集团是强势的卖方市场,借钱给西班牙、法国还是英国,全都他们说了算。有了钱才好办事,仗就能打赢,打赢了才有钱还债,以后更方便借钱。王室代理人可不是好当的,就算女王陛下也“刷不了脸”,当时的英国相对还很弱,何况一摊子旧债还没能还呢。能不能借到钱,主要得看国家有无清偿实力,要以海关税收或者伦敦财政,还有代理人自家的财团作担保。

格雷欣把自己身家都压上去了,难道就是为了王室情谊吗?当然不可能。一方面是以服务来换取政治地位和贵族身份,另一方面是借此拓展财团的海外贸易。归根结缔,这是



书名:《王室与巨贾》
作者:赖建诚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权力和金钱的联盟,虽然王室是更有力量的掌控方,但格雷欣凭借借用商人这个头衔的

号召力所得到的经营特许权,还有各种难以明说的潜在利益。16世纪是从中世纪晚期进入近现代,也是进入重商主义和产业革命的准备阶段。都铎王朝,特别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西班牙走向衰落,而英国逐渐上升,为即将形成的“日不落国”奠定了基础。格雷欣从中斡旋的几次成功借款以及延后还款,对于稳定英国经济肯定起到了作用,但赖建诚指出,这种作用不宜过分夸大,很多历史学家的看法不够准确。本文开头所说的“格雷欣法则”,就是因为英国经济学家 Henry Macleod 在《政治经济学要义》中的误用而流传开来的。另外,关于学界普遍认可的格雷欣操纵汇率市场的问题,赖建诚提出了异议,通过各种数据对比,无论是格雷欣或者其他英国财团,还是当时的英国财政,都不具备挑战欧陆金融集团的经济能力。所以记载于格雷欣手稿的这部分内容,只可能是一个设想,当时英国政府并未采纳。

如何评价托马斯·格雷欣?赖建诚说:“格雷欣是支撑性的柱子而非主体结构。”这话算得上是一种恰当的历史定位。16世纪下半叶英国经济回升,主要是两位女王勤俭避战、重拾信心的功劳,格雷欣在其中并未扮演太明显的实质性的角色。不过,作为重商主义代表人物,对格雷欣的研究以及延伸解读,是窥视当时历史风貌的一个很好的入口。

革新时代需要贝尔实验室

□郑渝川

公共政策以鼓励创新、扶持创业为导向,本身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企业家不是扶持、培养、激励就能涌现的。某种程度上讲,乔布斯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乃至更早以前的爱迪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创新天才,不存在改善政策就能使之更快涌现或是涌现出更多的这样的叛逆型天才的可能。政策再好,培养不出下一个乔布斯。

培养乔布斯,并不可行,但复制贝尔实验室,就更具可行性。贝尔实验室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产出先进科技成果(包括理论成果、实用发现、新技术与新材料)数量最多、也最为密集的创新机构。从晶体管,到通信、通讯领域你能想象的几乎所有新技术、新材料及理论架构,包括蜂窝电话、通信卫星、太阳能电池、光纤、长途电视传输系统、高清电视、传真机、按键电话、激光器、数字调制解调器,C和C++语言、数据库及分组技术、网络管理与操作系统、UNIX操作系统等,都来自这家研究机构。在二战期间,正是因为贝尔实验室的加入,才使得原子弹之外的盟军其他多项前沿武器研究,快速赶超德国和日本,并最终起到了更快终结战事的积极作用。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创,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反垄断的理由分拆,贝尔实验室一直是全球最为顶尖的创新研究机构,涌现出默文·凯利、比尔·肖克利、克劳德·什农、约翰·皮尔斯、比尔·贝克等一大批不同时代的天才科学家。这样一家创新研究机构,何以能够在长达60年的时间内始终长盛不衰,以精妙的眼光筛选出



书名:《贝尔实验室与美国革新大时代》
作者:(美)乔恩·格特纳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最具潜力的创新天才,还能对这些天才创造绝佳的创新环境?贝尔实验室为何能够一方面高效地转化利用各项革命性的创新科技,创造丰沛的商业成果;另一方面在商业与研发创新之间建立起隔墙,确保天才科学家们不受侵扰,不需要去考虑人际关系、公司收益、股民利益等他们根本不属推理的问题?

在当下的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不可阻挡的踊跃浪潮,越是如此,越应避免创新的短视化(满足于能够一时变现的杀手级应用的渐进式创新),越应当借鉴贝尔实验室的机制,创造出类似的创新环境,更好地驱动和支撑激进式创新。

《纽约时报杂志》撰稿人、《快公司》杂志编辑乔恩·格特纳所著的《贝尔实验室与美国革新大时代》一书,以史诗般的文体向读者呈现了贝尔实验室的光辉岁月。作者通过对大量档案材料和历史记载的梳理,根据贝尔实验室一大批顶级科学家在世期间留下的口述史资料,写成此书。

贝尔实验室创办初期,吸引了一批对星系、电话线路、电台、无线设备感兴趣的年轻人。这些人都亲手组装过无线设备,注重自然世界,善于借助现有资源用创新的方式而非因循守旧去面对困难,再予以解决。贝尔实验室的第一代创新核心默文·凯利,亲自招聘了后来大放光彩的肖克利、菲斯克、伍尔里奇、汤斯。贝尔实验室创立之初,也开启了学术交流传统,不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顶级学者或实验室专家,都会获邀为员工讲授最新的科学发展,建立了宽松友好的学术交流空间,而这成为了新思想的触发源头。

贝尔实验室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建立起高度开放和包容的环境,让各学科专家能够尽情施展才华,能够建立起彼此之间友好的协作关系。这在通信、通讯领域至关重要,化学家团队研究更便宜的新型保护材料,从塑料到橡胶,再到各类金属,防止电话电缆因雨水和冰冻侵袭而中断使用;另一些化学家团

队则要努力改进保护层和电话线间的绝缘部分;电子学方面的工程师专注研究回声、信号延迟、失真、信息反馈等问题。为了管控和协调多学科研究进展,应用探索,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家沃尔特·休哈特还发明了后来人们熟知的质量管理体系。

很多情况下,新发明是瞬间出现的,发明家往往会有令人吃惊的顿悟,但这个世界上,更多的发明是各种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逐渐变得更为清晰,再获得更多、更多力量的助力,最终喷薄而出。考虑到当代科学、科技应用发展的多学科化、复杂化趋势,可以认为,贝尔实验室这样的宽松集体制,更可能成为催生伟大创新的体制环境。尽管20世纪70年代,小作坊式、个人英雄主义驱动下的创新浪潮,一度盖过了贝尔实验室及与之同类模式的创新机构的锋芒,但到了后来,所有的独行侠,包括最不受羁的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以及谷歌的三巨头,都组建起了效仿贝尔实验室的院所创新体系。

贝尔实验室的天才科学家们亲手打开了人工智能的大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将非常彻底的重组社会。1951年,默文·凯利就预测,“未来的网络会在许多方面与人类大脑和人类神经系统的生物变得更为相似,这是其黑暗的一面”。这个实验室的很多元老而今还任职于谷歌、微软等科技公司,或者是曾作为老师、导师的角色引领新时代的弄潮儿涉足创新。我们应当铭记贝尔实验室,记住这所实验室天才科学家们的功勋,也需要把他们的担忧和警示放在心头。

■ 新书快递

英雄领导力



作者:威廉·科恩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德鲁克曾经的学生及朋友、领导力专家、已退役的威廉·科恩将军揭示了英雄领导力所包含的内容——以绝对诚信带领团队的同时提升个体表现臻至最佳,并为了共同利益打造团队奉献精神。

《英雄领导力》一书基于科恩对超过200名离开军队后在平民生活当中事业有成的军事领袖的调研,考察了军事领导力准则在商业和生活当中的应用,并解释了为何英雄领导力在千百年来总是能成功且符合伦理标准地施行——尽管有种种巨大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艰难险阻。

英雄领导力的八大通用准则是:恪守正道,刚正不阿;精通分内之事;表明你的期望;展露非凡的奉献精神;积极应对,乐观期待;关照自己人;职责重于己身;身先士卒。

作者简介:

威廉·科恩,美国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美国众议员、参议员和美国第20任国防部长,卸任国防部长后,他创立了科恩集团。

奠基者



作者:约瑟夫·J·埃利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这本标志性的历史著作中,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美国的斯芬克斯》作者展现了一群天赋异禀但同样拥有深刻缺点的人——汉密尔顿、伯尔、杰斐逊、富兰克林、华盛顿、亚当斯和麦迪逊——是如何对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从而为美国确立了前进道路。

美国在1790年是非常脆弱的。在随后十年中,建国之父们——在这本著作中被重新审视——将他们在《独立宣言》中的理念和宪法条文结合起来,创造了美国政府的实际运作机制。本书剖析六个令人着迷的故事: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亚当斯政府和亚当斯夫妇的政治伙伴关系,有关建都地点的争论,富兰克林试图让国会处理奴隶问题,以及杰斐逊和亚当斯夫妇之间的通信往来。《奠基者》让美国历史中最重要十年中的核心问题和人物,生动地在我们面前再现。

作者简介:

约瑟夫·J·埃利斯著有多部美国历史著作,包括《激情满怀的圣人:约翰·亚当斯的品性和遗产》和《美国的斯芬克斯:托马斯·杰斐逊的品性》。

穿越百年中东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现代中东问题的起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在一战前,几乎整个中东地区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羽翼之下,随着帝国的崩溃,一系列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起来。但由于新建国家的政治不成熟、经济不平衡、宗教冲突频发,导致了近百年来纷争不断。

本书以游走、研究的方式,讨论了百年中东纷争的来龙去脉。以历史的脉络为经,将中东问题总结为几个大的题目进行分章,穿插以作者的现场观察,以故事的形式再现百年中东的矛盾和冲突。

作者简介:

郭建龙,独立作家,社会观察者。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辗转于经济、媒体、探险等各个领域。出版有小说《告别香巴拉》,文化历史游记《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以及经济类图书若干。